

趙春山（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）

# 蘇聯「新思維」下 的三角關係

## 提要

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面對內政、外交困局，被迫從事「重建」與「公開」，以求在危機中尋求轉機。但是，西方應該加以注意的是，蘇聯的政策改變並不等於蘇聯的本質也已改變。戈巴契夫已成功地運用宣傳的力量配合其彈性外交，使西方目眩神搖，特別是中蘇共兩大共產巨人的關係正常化，已為三角關係投下了一個新的變數。回顧歷史、面對新局，美國應知「中共牌」之不可恃，從而儘速重新調整策略，才有可能扭轉不利的情勢。



「外交是內政的延長」，這句話用來形容共黨國家的對外政策，特別具有重要的意義。自從戈巴契夫登上克里姆林宮的權力寶座後，蘇聯的內外政策皆發生重大的改變。由於扮演兩大超強之一的角色，蘇聯的對外關係，尤其引人注目和重視。

### 戈巴契夫從危機中尋求轉機

觀察戈巴契夫的對外政策，可能必須從他的外交理念着眼，而戈某的外交理念，或多或少又受到蘇聯國內環境因素的影響。衆所週知，戈巴契夫是在赫魯曉夫統治時期，崛起於蘇聯的政治舞台。他沒有史達林時代的官僚政治包袱，當然也比較缺乏那股腐化的官僚政治習氣。但是，不幸的是，戈某繼承的卻是一個被形容為新史達林主義的政權，一個沒落的龐大共黨帝國。

從政治的層面看，經過布里茲涅夫的長期領導，蘇聯雖然沒有瀕臨列寧所謂革命前夕的崩潰邊緣，但至少已陷入西方政治發展學者所形容的危機之中。蘇聯的政治結構鬆散，領導班子老化而缺乏應變的能力；在經濟領域方面，制度上的缺乏效率加上人爲的因素，使得生

產力偏低，經濟成長停滯，人民生活水準無法獲得顯著改善。政治和經濟的難題，其所反映的社會現象是怠工、酗酒、犯罪率升高，以及民衆普遍的疏離和對現實環境的冷漠。

同樣地，蘇聯的對外政策也是乏善可陳。蘇聯入侵阿富汗的結果，不但使它刻意塑造的七〇年代和解蕩然無存，同時亦嚴重地損害到它在「第三世界」的形象。在共黨集團方面，中蘇共的關係正常化過程，因爲蘇聯對「三大障礙」的優柔寡斷，一度陷入僵局狀態；東歐日益高張的自主化傾向，令蘇聯頭痛不已；到戈巴契夫上台的時候，蘇聯在軍力方面雖仍維持超強的地位，但龐大的軍費開支，已非百病叢生的蘇聯經濟所能負擔。

### 政策改變並不等於本質改變

戈巴契夫不是俄國歷史上第一個發動改革的領袖，但和其他的共黨領導人比較，戈某的作風比較大膽，也比較善於利用大眾傳播媒體，把他的改革的訊息，傳達出去。蘇聯新聞媒介呼籲的所謂「新思維」(novoe myshlenie)，即以新的方法，處理社會、經濟、政治等

各項問題，基本上代表了戈巴契夫的行為模式。戈某提出

的「重建」（perestroika）和「公開」（glasnost）概念，也可用來解釋他在處理對外關係問題的手法。

葛羅米柯的退出蘇聯外交舞台，不單是克宮高層人事傾軋的結果，同時也是蘇聯對外關係優先課題的重建。基本上，戈巴契夫仍是列寧主義的信徒。他的世界觀明顯地反應在他「重建」一書的國際關係部分。戈巴契夫相信權力政治，那是列寧所揭示的「一方所得即他方所失」（kto kogo）的傳統鬭爭方式。換句話說，戈巴

契夫認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制度，不是永遠都是處於共存狀態的。只是，基於雙方目前力量對比的評估，蘇聯沒有能力和資本主義作最後的攤牌。

美國仍是戈巴契夫眼中的首要和潛在的敵人，但和其前任不同的是，戈巴契夫不願把外交重點擺在華府和莫斯科的互動關係上，不願視美國為唯一的談判對手。

戈巴契夫的策略是透過影響與美國利益相關的國際角色，削弱美國的談判籌碼。以瓦解敵人內部堡壘作為打擊敵人的手段，本屬共黨一貫的手法，戈巴契夫應是個中高手。

#### 宣傳配合外交西方應接不暇

於是，我們目睹戈巴契夫在西歐展開的一聯串笑臉攻勢，蘇聯對於歐洲核武談判所持的彈性立場，以及提出削減華約駐軍的主張，令北約盟國的領袖不禁怦然心動。連素有「鐵娘子」之稱的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，也抵擋不住戈巴契夫的強烈誘惑，認為這是一個可以打交道的共黨領袖。

戈巴契夫當權後，中蘇共關係正常化的腳步大為加速。對於中共所提的三項先決條件，莫斯科方面採取了妥協但卻十分彈性的立場。預計今年夏天舉行的高峯會議，將是雙方關係史上的一項突破。儘管這項會議的宣傳價值超過實質的意義。但它至少顯示出，中蘇共之間已經沒有重要的分歧尚待解決。

戈巴契夫最引人注意的應該是他對「第三世界」的外交攻勢。蘇聯與「第三世界」國家交往，基本上存有先天上的弱點。蘇聯的產品在「第三世界」不具有市場競爭力，其經濟發展模式亦不值得仿效；蘇聯意識形態

由於受到環境因素的限制，也沒有在「第三世界」地區引起當地民衆產生共鳴的條件。蘇聯雖然曾經運用其強大的軍力，作為其實施「第三世界」政策的工具，但付出的代價太大，常常引起中小國家的戒懼。戈巴契夫上台後，極力扭轉蘇聯在「第三世界」地區的形象。非軍事性的外交政策工具，逐漸受到蘇聯決策者的重視。同時，為了和這些發展中國家建立良好的關係，蘇聯理論家給與「民族解放鬥爭」一個新的內涵。經濟合作和集體安全的概念，逐漸取代過去支援當地共黨暴力革命的訴求主題。

### 中蘇共關係正常化改變三角關係

戈巴契夫的外交行為，也可從其「公開」的概念中一見端倪。「公開」代表消息的流通，以及鼓勵大眾的參與。「公開」可以視為戈某「重建」政策的手段。共產黨人一貫重視宣傳。宣傳包含口頭的煽動和文字的運用。戈巴契夫特別注意對外宣傳，並且充分掌握了科技革命下的宣傳要件。對於西方記者而言，戈巴契夫可能是蘇聯歷來最為「合作」的共黨領袖。西方民衆也驚喜

地發現，戈巴契夫竟然會主動提供他們直接溝通的機會。這就顯示出這位蘇聯領袖的與衆不同，從而產生對蘇聯新外交政策的聯想。實際上，蘇聯目前對其境內不滿分子的一些讓步（與過去比較），也經常收到國際宣傳的效果，這都大大有利戈巴契夫對外關係的「重建」。

目前最使世人感到關切的是，戈巴契夫的外交動向，對於變化多端的三角關係，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。分析這個問題之前，概略地回顧一下過去三角關係的演變，誠然有其必要。從蘇聯的觀點看，戰後初期的「兩極政治」，雖使美蘇處於針鋒相對的狀態，但中共的「一邊倒」政策，使蘇聯免於兩面作戰的威脅，雖然中共當時的力量，無助於美蘇戰略平衡的改變。步入六〇年代，美蘇仍維持敵視的狀態，但中蘇共關係卻由文鬥而發展成武鬥。中共持續的反美態度，使三角關係從兩極而走向一個不確定的三極型態。任何一方皆無法利用其他的角色，來對抗其設定的對手。自從尼克森一九七二年訪問北平和莫斯科後，美國採取「以談判代替對抗」的政策，美蘇之間，以及美國和中共之間的關係，都有了戲劇性的轉變。大致而言，東、西雙方此時的關係，被形容為一個和解時代的開始，但在共黨集團內部，中蘇

共仍維持敵視的形勢。

自從蘇聯於一九七九年發動對阿富汗的軍事入侵後，和解成了令人嘲弄的名詞，新的冷戰氣氛再度瀰漫於美蘇之間。而北平和華府雙方的關係，卻有了重大的突破。在美國國內，「中共牌」成了一些學者政客用來制衡蘇聯的戰略籌碼。美國和中共之間仍未結成軍事同盟，但次同盟的雛形卻已出現。如此，三角關係的特色是美國和中共的鬆散結合，用以對抗共同的敵人蘇聯。

### 從三角關係歷史中記取教訓

進入八〇年代，蘇聯為了扭轉其在三角關係的不利地位，積極對中共進行拉攏的工作。與此同時，美國和中共之間，因為「台灣問題」，科技轉移和貿易談判等問題引起的歧見，加上中共推行現代化的努力，提供了蘇聯改變三角關係的客觀條件。戈巴契夫的對外政策，基本上是要有效運用這些客觀條件，並且加上蘇聯內部政治發展的主觀因素，以增強蘇聯的國際地位。

如果戈巴契夫的政策獲致成效，整個三角關係將會朝下列的方向發展：

第一，中共在三角關係中的比重，無形中大為增加。有些人認為中蘇共關係的改善，會使「中共牌」的價值降低。但另一方面，我們也不應忽略，中共標榜的獨立自主外交路線，以及中蘇共的言歸於好，提供了中共在美蘇之間，左右逢源兩面討好的機會。「獨立自主」和「中立主義」不同。中共的自主路線，意味著它可適時調整其政策方向，爭取最大的利益。從過去的經驗顯示，無論一邊倒向蘇聯，或是對美故作姿態，都有使中共陷入非友即敵的不利選擇之中，有遭到兩面夾殺的危險。

第二，戈巴契夫的外交努力，改變了美國整個戰略構思的前提，使華府相對地處於不利的地位。儘管中共暗示或明示，它與蘇聯關係正常化的幅度，不會超過它與美國的現行關係。但是，美國今後可能無法再將美中（共）的反蘇平行戰略利益，視為理所當然。一旦美蘇交惡，中共不會因為支持美國，甘冒觸罪蘇聯的危險。畢竟，遠水救不了近火，美國不可能直接涉入中蘇共之間的任何衝突之中。

第三，蘇聯將是未來三角關係中的贏家。中共固然無法成為美蘇競賽中的「資產」，但至少不應成為蘇聯

的「負債」。中蘇共關係正常化產生的最大利益，是促進了「社會主義大家庭」的重新團結。而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地位的提升，不但確認了蘇聯的超強角色，並且有助於它和美國的討價還價。

### 面對新局美應妥為因應

總之，在華府、北平、莫斯科三者之間的牌局中，

由於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改變，未來可能出現主客易位的現象。蘇聯一向以「力量對比」（correlation of forces）的觀念來代替西方的「權力平衡」。而在估計力量對比的時候，一種立場未確定，態度不明顯，屬於「徘徊價值」（wandering value）的角色，常常被蘇聯戰略家視為足以影響事件結果的因素。從這個觀點看，戈巴契夫爭取中共的好感，顯然有其理論的基礎。

美國布希政府外交政策的首要課題，將是如何面對一個轉變中的三角關係。過去強調「聯中共制蘇聯」的

戰略設計，已經面臨了嚴重的考驗。它增強了中共的國際地位，也印證了「中共牌」之不可恃。今後，美國勢必要重新調整其對中共的政策。如果「制蘇」繼續作為此一政策的前提，則美國將提供什麼樣的條件，足以說服中共願意犧牲它和蘇聯加強關係得到的利益？如果美國放棄「制蘇」的戰略設計，則它和中共之間又有什麼「平行利益」值得共同去追求？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必須確定的。

另一方面，三角關係的改變，對於國際體系的衝擊，將會影響到國際社會的每一個成員。戈巴契夫的列寧主義外交行為，結合了理想和現實的色彩。由於中蘇共的改善關係，今後的國際政治體系，是否會從多極或鬆散的兩極，重新回到以意識形態為主軸的戰後兩極政治理型態呢？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。強調現實主義的學者，或許很輕易地作出了「否定」的答案。但證諸三角關係的演變，誰會想到敵友之間的分界線，竟是如此地含混和脆弱。